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

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

[美] R.J. 史密斯著

汝企和 译

余永定 郭方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2-206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世纪的中国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

(美)史密斯著；汝企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书名原文：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The Ever-Victorious Arm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SBN 7-5004-3648-3

. 中... . 史... 汝... . 雇佣军—研究—中国—19
世纪 . 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1718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 6

字 数 236千字

印数 1—4000册

定 价 2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0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译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译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虞和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常务编委 夏春涛 张小颐

序 言

塞勒姆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神秘主义者、“华人”查尔斯·戈登，在1860年代初成功地指挥着常胜军与太平天国叛军作战，保卫了上海。西方传说里充满了这些人的传奇故事，但人们对他们作战的背景和支持他们的中国人知之甚少。常胜军似乎仅仅是中国骚乱之海中的外国人的功业。

理查德·杰·史密斯基于中、外双方面的史料对常胜军进行了研究，从而将它从传说的王国引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它是一支小型的、外国人指挥的中国突击队，作为当地商人和官员资助的、用于击败激进主义和叛乱的雇佣军，它符合公认的中国军队的模式。事实上当时活跃着若干名称同样华而不实的其他中—外部队，而常胜军是其中规模最大、名声最响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常胜军（拥有）的外国大炮和连发步枪，以及它所运用的、由长江三角洲水路上的明轮蒸汽船实施的两栖战术，使该军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新的技术方面的重要地位。但它又是中国军队吸收非中国人将领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华尔不仅获得了清廷军事体系中的军衔，而且他的主要经济赞助者商人杨坊成为他的中国岳父。华尔为了在中国的冒险，甚至放弃了美国国籍。从清廷的观点看，虽然华尔被任命为中方的联合指挥官，他的军队后台老板又都是中国人，但仍不能丝毫放松对他的控制。“华人”戈登是正式的英国军官，他造成了新的责任与限制问题，但他继承了华尔建立的进

取精神的传统，并在巨大障碍面前赢得了重要的胜利。

常胜军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它创建于上海的英、法、美三方都在清朝军队和太平天国叛乱者之间严守中立之时。华尔最初的“马尼拉人”部队提供了将西式武器用于平叛的途径，但它也给中、外双方带来诸多政策上的混乱。后来，在中国军队取代了华尔军队中的菲律宾人之后，外国列强发现常胜军是参与平叛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列强逐渐把常胜军以及模仿它的部队视为推动现代化的手段。但西方寻求改革中国行政并使之中央集权化的目的，在于创建有助于西方贸易与教会活动的环境，而中国的目的则有限得多。在许多方面，1860年代初清政府对常胜军及其外国军官的政策，集中体现了整个19世纪里中国对军事改革的观点。

理查德·杰·史密斯是在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之时开始这项研究的。他精心而广泛地运用材料，出版了一部详细论述常胜军管理与成就并评价其历史作用的著作。这部著作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费正清
于哈佛大学

前 言

1839—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1860年英法占领北京之后，西方的影响在中国的革命性变革中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在这一变革的初期阶段，主要有四种人占据着舞台中央，他们是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和军人。每种人都给中国带来新的观念、成果、习惯和技能，起到推进现代化的作用。同时，这些西方入侵者对中国社会，令人生畏的贵族特权，国内经济，中国人的天下一统观念，最终是中国的主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学者们对这四种外国人的最后一类——西方军人注意最少。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因为正是西方军人，造成了外国早期侵略中国的历史，使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政策制定者首先考察的是军事事务，并在1860年后广泛雇用外国人担任各种军职。同治时代（1862—1874年）早期，当清政府开始沿着西方的路线使某些清军现代化之时，作为顾问、教官和军官的西方军人具有双重意义：他们不仅通过介绍西方武器和军事技术来推动中国的“自强”，而且也在处理各种层次的中外关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书的研究从这两方面以透视方法考察了西方介入中国军务的源起，其焦点即常胜军，它是一支富有革新精神和引起争议的外国人指挥的中国军队，曾于1860—1864年间在战略重镇上海地区与太平天国叛军作战。尽管这支地处上海的部队是186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清军，但常胜军仍像该条约港本身一样，反映出伴

随中国对外关系新纪元而来的文化变革所造成的紧张状态。这个新纪元以中国行政和军事的若干关键部门内外国干预的迅猛增长为标志。这种干预现象通常被称为“双头政治”。

双头政治产生好坏两种结果。它不仅是推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潜在工具。在军事事务范围里使用外国雇员有希望在训练、技术甚或组织方面给中国带来迅速而确实的利益。同时清朝政策制定者绝对不能忽视这种政策带来的危险。从历史上看，在军事事务中雇用外夷充其量也不过是产生利害兼有的结果，正如唐代（618—907年）的经验所生动表明的。中国官员决不会忘记755年安禄山叛乱的灾难性后果，也不会忘记同一时期回鹘人的要求和劫掠。中国人认为，19世纪中叶的西方“蛮夷”比这些都要可怕得多，他们有令人生畏的武器和侵略倾向，而且已将印度殖民地化，并大量渗透到东亚地区。

由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所组建，后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英雄、“华人”查尔斯·戈登所指挥的常胜军，成为第一支西方军官统帅的、训练运用现代西方武器和战术的中国军队。其士兵按照英语军令行动，身着半西式军装，并由此得到“假洋鬼子”的绰号。这支军队在某些方面与驻印英军里的印度部队相似，它也像这些印军一样被许多外国人视为英国政策的工具。但该军虽身着西式装束，却仍是中国军队，它由中国士兵组成、由中国的财政维持，而且受到视清廷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军官的管辖。外国军官旨在使该军“西洋化”、使之为自己目的服务的推力，总是遭到清官员反方向拉力的抵抗。常胜军的历史就是这两种对抗势力搏斗的历史——一场在骚乱的19世纪的剩

见费正清编辑的《中国人的思想与制度》（芝加哥，1957年版）一书中，费正清的文章“条约下的双头政策”。——原注

余时间里、在其他许多领域内耗尽中国人精力的战斗。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教益。对他们表示感谢容易，报答却很难。给我教益最多的是刘广京教授，他不断的帮助和鼓舞、内行的指导，对中国近代史渊博的学识始终激励和支持着我。许多其他人的帮助也是杰出的，如杰·庇·罗教授对中国早期历史丰富而贴切的评价；彼得·帕瑞特与彼·赫·利德尔·哈特教授对研究军事史之价值的洞察力；简又文教授对太平天国叛乱独到而深邃的个人见解。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以各种方式为本书做出了贡献，我由衷地向他们全体表示感谢。我感谢莱斯大学为我提供的两次夏季研究补助金，感谢其他众多院校慷慨地为我提供人力物力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塞勒姆的埃塞克斯学院，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和大英博物馆，查塔姆的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南刚的汉学研究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伯克利和洛杉矶）的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还要感谢珍妮·沃索尔女士，她灵巧而兴致勃勃地打出了这部书稿，还有我的父亲约瑟夫·彼·史密斯，他在撰写的各个阶段精心而批评性地阅读了书稿。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利萨·史密斯对我的深厚情义，她的帮助、鼓励和理解是我的无价之宝。

导 言

晚清时期中外关系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中国政府在文职和军事部门的各个领域里雇用西方“外夷”。这种中国权力机构中的外国参与具有多种形式，如从效率很高且必不可少的帝国海关机构内使用罗伯特·赫德领导的由多国组成的官吏集团，到在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和“华人”查尔斯·戈登指挥的著名但常惹麻烦而且短命的常胜军内雇用外国军官。这种求助于外夷援助的做法是有大量先例为基础的。在清廷衰微的岁月里，这些援助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19世纪的西方人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外国雇员的新型外夷，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物质优势颇具自信，热衷于改变而不是接受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的“权利”所赋予的特权，与本国政府的政策和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外国政府1860年后在中国大地上保持着外交上（有时是军事上）的地位。

从清政府的立场出发，任用如此傲慢而难于管束的外夷承担管理部门的职责不仅是耻辱，而且也是潜在的威胁，在军事部门尤为如此——它们成为清廷经常严密监视、控制的领域。19世纪中叶，曾经强大的清朝，其军事状况已衰落到最低点。朝廷失去了自信但仍颇有自尊，它以一种担心、猜忌、蔑视交织在一起的态度看待西方人——恶意地排外的咸丰时期（1850—1861年）的文告反

映出这种复杂的、感情色彩浓重的观点。然而咸丰皇帝死后的数月之内，陷于与太平天国叛军殊死搏斗的清政府就开始雇用华尔、戈登这类西方指挥官，来组织和统率平叛的中国军队了。

雇用这些人所引起的问题，使人联想到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某些与之相类似的问题：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补充的外国援助问题，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和对外来压力反抗的增长问题，以及在复杂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军事所起的作用等问题。但19世纪中叶清政府雇用西方军事人员时的局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在1860年已处于其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前此的20年里，清廷面临内部、外部双方面的可怕挑战，但哪方面都未得到有效的应付。外部是入侵的西方列强，它们追随英国的先例但相互间又有激烈竞争，为了商业和传教的利益，它们一直想撬开中国的门户。内部则是社会压力和国家管理的衰败导致四处蔓延的叛乱，它们耗尽了朝廷的物力资源，损害着朝廷的威信，并使其军事弱点暴露无遗。中国历史上常出现这种局势，传统上用简洁的成语“内忧外患”来形容它。但1850年代两种威胁相继赫然耸现，这种情况在自此成语产生以来的含意中是前所未有的。

带来声名狼藉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代表着西方第一次以暴力迫使中国接受对外关系的新秩序。但清廷既未迅即放弃传统的以不平等的纳贡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也未允诺列强为自由贸易和向北京派驻外交代表而提

阿瑟·赫梅尔编辑的《中国清代名人》（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版），：379。

请见艾尔弗雷德·瓦格茨的《防务与外交》（纽约，1956年版）第六章。莫里斯·贾诺维茨的《新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军人》（普林斯顿，1964年版）；约翰·杰·约翰逊编辑的《不发达国家中军人的作用》（普林斯顿，1962年版）。

出的全部要求。因此1850年代末，中西战事又起，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中国首都，列强才摧毁了中国的“国家尊严”，最终获得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

与此同时，被某些人认为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反叛（1850—1864年）在中国南部爆发并向北方蔓延。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叛是因日渐增长的人口压力、政府各级官吏的日益腐败、严重的经济混乱和社会的极度紧张状态而引发的，它在规模和目标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太平天国要摧毁的不仅是清廷，而且是传统社会制度本身。尽管在十年严酷的战斗里太平军遭受了数次过早的挫败，但他们仍构成对清政府的可怕威胁。1860年初，正当英、法准备进军北京、捻军（1853—1868年）继续活跃于北方数省时，太平军冲破其首都南京之围，闯入几乎未受损害但极为富庶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这次复兴对关键的条约港上海造成直接威胁，使清政府陷入恐慌，并迫使西方列强决定是在冲突中继续保持中立，还是支持交战的一方或另一方。

因此1860年是转折点。在此以前，没有人会自信地预言，由不务政事，日益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皇帝所领导的虚弱的清政府能战胜太平天国。而且即使太平天国不能在中国建立新的、较为进步的秩序，那么事态发展仍然可能是太平军，狂暴的捻军，或是二者联合，攻入北京，使清首都或整个国家陷入混乱。1644年正是这种局势，导致明王朝的灭亡、满族人的成功入侵和在中国建立“大清”旗下的异族统治。西方列强作为近代的入侵者，为保卫

请见伊曼纽尔·徐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外交形势》（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0年版）。

弗朗兹·迈克尔的《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献》（西雅图与伦敦，1966—1971年版），1:4。

其商业和教会利益，可能发现对全部或部分中国强迫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是必要的，至少是有利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政策制定者，都不会忘记这种局势的爆炸性潜力。

无论可能性如何，清政府依然完好无损，而且还不知不觉地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元气。到1864年中外关系的新纪元开始，太平天国已在西方援助下被消灭，中国已与西方列强合作，着手实施旨在“自强”的有限的军事现代化方案。这些就是常被讨论的“同治中兴”（传统说法的日期是：1862—1874年）的主要成就，正是在此基础上，清廷的统治才得以在跨入20世纪后还延续了整整十年之久的。

“中兴”时期的基准线——1860—1864年期间——同时标志着常胜军的活跃年代，这绝非偶然，因为这支由华尔、戈登指挥的军队，至少是历史上在紧要关头作战的那些最重要的军队的再现，而且常常是更为集中的再现。最初为反击太平天国对上海的威胁而组建的这支军队，立即成为以“合作政策”著称的对外关系新秩序的象征，成为平叛的工具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模式。

所谓的“合作政策”产生于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它使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和共同振兴中国军力成为可能。它不仅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英、法、美、俄——之间的合作，而且也含有列强相互之间合作之意。但“合作政策”事实上合作得如何呢？各西方国家在涉及其在华利益的全部问题上意见无疑是不一致的，

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的《中国与西方，1858—1861年：总理衙门的创始》（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4年版），第44—53页；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持续：同治中兴（1862—1874年）》（纽约，1967年版），第12—13页。

欲知对自强运动的总看法，请见伊曼纽尔·徐的《现代中国的崛起》（纽约，1975年版）第二章。

权威著作是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

尽管它们一般倾向于听从英国的领导。更为分歧的还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和愿望，它需要西方的援助却又憎恶外国的干预。

常胜军身为体现东、西方之间共同分享的新合作精神而出现的第一批中西制度性的组织之一，集中反映出合作政策背后的冲突与妥协。虽然列强和清政府都将常胜军视为引起政策纠纷最少的、消灭太平军的工具，但对于如何部署和发展该军的各种不同意见必然会产生摩擦。西方列强之间为扩大对常胜军（及其他仿效该军的外国人训练的部队）影响的竞争，表明合作政策平静的表面下存在着强大的对抗暗流，而中国遏制西方影响的努力又进一步增加了紧张和误解。中国人有经验丰富的“借材异地”的悠久传统，但在19世纪雇用西方指挥官却是富有革新精神和具有潜在危险的措施。外国军官尽管表面上只听命于清政府，但他们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本国的价值观和政策的强烈影响。这些外夷雇员在原则或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会为谁尽责呢？这些外国人的存在使常胜军至少成为文化变革的执行者，并且有可能成为西方列强的工具，那么中国人又将如何处理因雇用这些人而产生的新的特殊的管束问题呢？

常胜军虽有各种缺点，但其作为中西军队的独特地位，使之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发挥着特殊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确切性质却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问题。19世纪一些观察家，甚至后来某些史学家都将击败叛军主要归功于华尔、戈登指挥的这支军队。其他人

这一论题见于布里顿·迪安的《中国与不列颠》（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20—21页。

奥·弗·唛喇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史》（伦敦，1866年版），2:585—586；《麦士尼的中国杂录》（上海，1895—1905年间时断时续地出版的），1:324；霍尔格·卡希尔的《一位美国冒险家》（纽约，1930年版）一书荒谬地宣称，如果没有华尔，“就不会有皇太后和李鸿章那些满族衰落时期的杰出人物的功业”。

则仅把该军视为军事作战最后一幕中的一个角色。为确定常胜军所发挥的真实历史作用，显然必须考虑到其他平叛军队的贡献。

1862—1864年间，当常胜军在江苏东南部作战时，英、法正在上海、宁波地区发动较有限的攻势。与此同时，杰出的曾国藩及其部下所率清军包围了数省，在辽阔的地区与叛军作战。虽然常胜军的特点——使用西方的武器和技术，既能与外国军队又可与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使它确实有可能在战争中发挥与其较小的规模相比大得多的作用，但是它的贡献或许仍被编年史家作为特例，或被那些缺乏深邃眼光的史家夸大了。甚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于教条地强调外国镇压太平军的侵略罪行，也对一些为华尔所作的言过其实的夸耀进行批判，而其他一些政治见解各异的著作则谴责戈登既帮助清政府又援助叛乱者。鉴于对常胜军及其外国指挥官的相互矛盾的证据和两极分化的观点，我们恰恰可以重复德国史学家利奥德·冯·兰克的问题：“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不论常胜军和平叛中作用如何，它几乎无法避免人们将它视为军事改革的一种可能的模式。1860年代乐观的在华外国官员就怀着这种目的，多次劝告清政府要支持常胜军，并积极施加压力要求建立新的训练部队以加速改革的进程。这种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鼓励既有出于利他主义的又有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他们不仅想到改革工作中的外国援助将扩大西方对中国事务的影响。而且也想到中国军力的增长将确保各条约港的安全和维持内部的稳

迈克尔的书，1:170—173。

祁龙威的《关于1860年7月华尔攻陷松江的经过》，见《历史研究》7.2（1958年），第16页；谢兴光的《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1935年），1:42；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史事通考》（香港，1958年版），2:716—720。

定——这是拥有四万万买主和灵魂的“中央王国”进一步“开放”的必要前提。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则希望军事现代化仅仅在使之既能平叛又可抵御外国侵略的范围内进行。显然中国对军事改革的承诺是有限的，但这些限度是如何规定的呢？

1860年代初，清官员里几乎无人愿意承认西方向中国提供了任何东西，及承认中国军队接受西方的武器和一些西方训练方法可能具有某种价值。但有少数深谋远虑的人看到了沿着西方的路线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必要。其中就有李鸿章，一位来自安徽的干练而精力充沛的学者和将军。他成为19世纪剩余时间里中国自强的主要鼓吹者。他是一位新式官员，比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多数中国人更重实效，或许也更爱国。他1862—1863年间在上海任江苏巡抚（当时的临时官设在该条约港）和他自己的新型清军的指挥官，这种经历使他有充分机会在与叛乱者作战时观察西方列强和常胜军。他这种独特的有利位置使他能够领悟到西方带来的挑战，以及为迎接这一挑战，借用西方的长处来建立强大的、自足的中国的必要性。李在上海的经历——尤其是他与华尔、戈登以及其他外夷雇员的接触——对于他对军事改革、利用西方援助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呢？

常胜军在其正式存在的短短两年内虽已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与清廷的军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该军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1860年代早期的编年史的狭窄范围。1864年常胜军解散后，军队的成员——既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加入了其他清军和训练部队，他们一方面为扩大外国的军事影响作出努力，另一方面也使外国军援带来的问题延续下去。

刘广京的《身为爱国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儒家：李鸿章的性格形成时期，1823—1866年》，载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30（1970年）。

与此同时，中国制定雇用外夷于文职与军务的有关政策时，常胜军依然是极其重要的参考，尽管19世纪末中国民族主义崛起，中国与西方的形势对比已发生了变化，外国援助仍然是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情。戈登本人于1880年返回中国，在所谓的“伊犁危机”期间提供了帮助。1890年代，外国军官仍在中国军队内服役，清朝官员在协商利用外国军援事务时依旧提到华尔、戈登的先例。虽然时过境迁，但张之洞的“自强军”（建于1895年）内雇用外国军官所引起的政策问题，仍与约30年前的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等人所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